

王熙鳳辦事，有快有慢。快就非常快，簡直是迅雷不及掩耳；慢就非常慢，好比是急驚風遇着個慢郎中。

快，舉一例。《紅樓夢》第二十三回，賈芹求職，走的是鳳姐的路子。當時，賈政想從小和尚道士「發到各廟去分住」，賈芹之母周氏「聽見這件事，便坐車來求鳳姐。鳳姐因見他素日嘴頭兒乖滑，便依允了」。果然，賈芹很快就得到這件差事。王熙鳳怎麼敢當場答應周氏？明明是賈政已經有了方案，並不需要專人管理，怎麼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，一下子就改變了章程？鳳姐就這麼有把握？

申之如

其實，對於鳳姐而言，這本來是小事一椿，她不過「想了幾句話，一打動了王夫人。意思是批評賈政的方案只顧眼前，娘倆再回來，哪裡找人去？不如一律送進家廟鐵檻寺，」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些柴米就是了。說聲買，走去叫一聲就來」，多方使。賈政果然改了主意，找賈璉去商議。王熙鳳則事先布置賈璉，「要是為小和尚道士們的事，好歹你依着我這麼着」。如此這般，賈芹的差事就到手了。

王熙鳳是真的為賈府考慮，為着預備再次接待娘倆回家省親，而不肯把小和尚道士高懸解脫的嗎？第二，大靠得住。第一，元妃能不能回家省親，得看皇上高興不高興；第二，就是再次回家省親，是不是一定需要這些小和尚道士，也還難說；第三，要是相隔時間太長，譬如說隔個五年八年，小和尚就變成大和尚、小道士也活像老道士了，何用之有？王熙鳳考慮的其實是自己的面子，周氏不求別人求自己，那是難得自己是賈府裡真正掌勺的，如果讓她掃興，等於證明自己無能。所以拿娘倆做由頭，是因為她深知賈政夫婦的心願。誰不願意自己的女兒年年回家來省親？

王熙鳳對此事瞭如指掌，處理事情當然也就得心應手了。所謂因人設事安插私人，這才開了個頭。



慢，也舉一例。《紅樓夢》第三十六回，金釧兒死後，有幾家僕人穿梭般來給鳳姐送點孝敬，還不時來請安奉承，鳳姐卻似乎不知何意，生了疑惑。平兒解釋說：「如今金釧兒死了，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當兒呢。」鳳姐卻說：「他們幾家的錢也不是容易花到我眼前的，這可是他們自尋，送什麼我就收什麼，橫豎我有主意。」書中寫道：「鳳姐兒安下這個心，所以只管耽延着，等那些把東西送了足，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。」

王熙鳳的「快」與「慢」

鳳姐兒的主意是什麼呢？就是慢慢拖着，先不辦事，等人送禮。禮送得足的話，她才把這件事提上日程。什麼叫「足」？送禮送到什麼份上才叫「送足了」？這些問題，都要問鳳姐自己才有答案，別人無法越俎代庖。但是天下一切貪官，運用這個拖着不辦的奧妙，倒是無師自通，一點也不比鳳姐差多少的。

什麼最重要

汪金友

二十歲的人說，學習成績最重要。一次考試分數，可以把人分為三六九等。「一本」、「二本」、「三本」、「大專」、「職專」、「中專」，成績好的上好學校，成績差的上差學校；成績好的風光無限，成績差的灰頭土臉。

二十五歲的人說，理想工作最重要。雖然說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狀元；雖然說，只要是金子，到哪都發光。但眼前的事實不斷地在提醒着年輕人，工作崗位的差別，實在是太大了。走什麼樣的路子，找什麼樣的工作，決定着一生的命運。

三十歲的人說，婚姻家庭最重要。首先，要有一個稱心的伴侶。看着省心，想着隨心，處着順心。其次，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不一定太大，但也說得過去。接着，要有一個可愛的孩子，健康活潑，聰明漂亮。

三十五歲的人說，人際關係最重要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人際關係就像是一道道的「橋」。有關係就有「橋」，沒關係就沒「橋」。有了「橋」，什麼都方便，沒有「橋」，啥事都難辦。於是很多急於進步和急於發財的人，都慨嘆沒有「橋」，並到處尋找「橋」。

四十歲的人說，事業成功最重要。剛走出校門的時候，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。到了四十歲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明顯地拉開了。有的升了官，有的發了財，有的出了名。那些得意者，往往會趾高氣揚；那些失意者，往往會垂頭喪氣。

五十歲的人說，兒女成才最重要。兒女是一生最大的希望，父母五十歲左右，正是兒女最讓人擔心的時候。能不能考上好大學？能不能找到好工作？能不能談上好對象？當有人誇獎他們的兒女有出息時，他們的心裡才會比蜜還甜。

六十歲的人說，身體健康最重要。該退的退了，該離的離了，沒有了上班的緊張，沒有了工作的紛擾，沒有了生存的壓力，現在最大的任務，就是養老。而且身體也在不斷發出信號，這兒不舒服，那兒也不舒服，似乎都在告訴你，此時健康最重要。七十歲的人說，心情愉快最重要。古語稱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到現在，能夠活到七十歲以上，也算超過中國人口壽命的「平均數」了。因此，每個人都應該尋求快樂和享受快樂。為發展快樂，為變化快樂，為親歷快樂。越快樂，越活着；越活着，越快樂。

馬車。衛：中醫和西醫。教：學校和私塾。娛：圖畫、音樂、舞蹈、小說、戲劇，中西合璧，彼此模仿。人們說，在電視裡看京戲是「寓中於西」。東方的城市生活一天也離不開來源於西方的交通設備、通訊設備和各種各樣的電器設備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，「大清帝國」改名「中華民國」、又改名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這就是宣告中國雙文化時代的開始。「中華」屬於中國文化，「民國」和「人民共和國」屬於西方文化。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是雙文化。「一國兩制」是雙文化。大學裡傳統文化課程很少，西方學術課程很多，這是「向外傾斜」的雙文化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，文化像水，不斷從高處流向低處。又說，要使落後趕上先進，必須研究雙文化的策略。有渾渾噩噩的雙文化，有航向明確的雙文化。

周有光先生指出，文化不僅有地域的傳播，更重要的是有歷史的發展。任何文化都是逐步發展和演進的。人類走出了原始生活之後，就開始思考人與人的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這兩大問題。人與人的關係的探索發展為道德和法律。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探索發展為科學和技術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：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最為典型。它從「中世紀」走向「現代」，經歷了文藝復興、宗教革命、產業革命、民主革命；政教合一改為政教分離，強迫信教改為信教自由，君主專制改為全民選舉，貴族教育改為平民教育；創造鐵路、汽車、輪船、飛機，發展能源，改進電信，使地球大大縮小；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發展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，現在世界上並存在着各種不同的文化，不僅形式不同，而且水平迥異。這樣，就發生所謂價值觀的摩擦。價值觀實際就是對「人與人」和「人與自然」的解釋。例如：上帝可不可以批評，婦女要不要解放，政治能不能民主。在多层次的文化世界中，文化的衝突和文化的融合將在「矛盾和統一」的辯證規律中繼續波動。

以上主要引自《雙文化與雙語言》一文（見《學思集——周有光文化論稿》）。周老有關人類文化的思考，遠不止這一篇，而散見本書和《百歲新稿》，如關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，文化的新陳代謝，科學的一元性，關於西化，關於儒學，關於宗教等，頗多輾轉入裡之論，都可參看。



徽菜三「奇」

日本仙台松島

潘思縝攝

在北京，天壇附近有幾家徽菜館不錯，我們幾個老鄉經常去，圖的就是那家的徽菜食材精到，還做出了點家鄉味道。要說吃徽菜，吃的就是一個山貨，講究的就是一個「奇」。

要想徽菜夠味道，食材生猛最重要，徽菜的精氣神大部分落在這食材上。食材是徽菜的第一「奇」。黃山邊上產的小竹筍、木耳、石耳、黃花、蕨菜，還有山雞、石雞、鷹龜、斑鳩都是做徽菜的上好材料。這其中鷹龜和石雞最是面目可憎，古徽州人敢吃牠，不得不說是一種大無畏的表現。據說當年宋高宗趙構聽說徽菜味道獨特，也動了口舌之慾，轉頭問身邊的大學士汪藻徽菜到底好在哪兒？汪藻低頭尋思靈機一動，用詩人梅堯臣一句詩答道：「沙地馬蹄驚，雪地牛尾狸」。這裡汪藻點出的，恰恰是徽州特有的兩種食材。馬蹄驚是甲魚的一種，但卻不同於泥塘裡的甲魚，牠生在沙地裡，肉厚質嫩，沒有土腥氣；牛尾狸則是俗稱的果子狸，肉質細嫩鮮美，比羊肉狗肉暖性還大，是冬季的傳統補食（現在是保護動物，已經禁止捕殺）。

伊北

其實反過來看，變質也是徽菜的一個特點，這是徽菜的第三「奇」。從源頭看徽菜的「變質」而有味，它令人有一種無巧不成書的奇妙感。

小舉兩例。古時候徽州地理條件惡劣，徽州人多跑出去做生意，隨身帶點豆腐準備路上充飢，還把它壓了又壓，終於壓成了鐵餅似的黑塊，拿起來嘗一口，倒出人意料的不同一番風味。這就是臘八豆腐。徽州人多地少，交通不便，很難吃到魚，外頭做生意的人回家時想帶點魚給家人嘗嘗鮮，誰知道路曲折，回到家，魚全捂臭了，家裡人拿着臭魚下了鍋，沒想到卻又是一番獨特味道，時間久了，竟成了一道上好菜品。這就是有名的臭鱖魚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一部徽菜史就是一部古徽州人的奮鬥史，它其實是古徽州商業文化的附載品。可在北京，跑遍全城也吃不到帶毛的臘八豆腐和有臭味的鱖魚，老闆說那是因為衛生上達不到標準，所以無法「原汁原味」。

其實去飯店吃那不正宗的徽菜，還不如自己動手做一個「一品鍋」。此菜由明代石台縣「四部尚書」畢鵬的一品誥命夫人余氏創製。據說有一次，皇上突然駕臨向尚書府作客，席上出了山珍海味外，余夫人特意燒了一樣徽州家常菜——火鍋。不料皇上吃得津津有味，讚美不絕。後來，皇上得知美味的火鍋竟是余夫人親手所燒，便讓人來選是「一品鍋」！菜名就此一鑒定了音。這菜做起來也還方便。一隻小鍋，最裡面一層鋪上火腿、木耳等其他佐料，再放上一層冰糖，之後依次鋪上小竹筍、山雞野兔肉、五花肉，最上面一層是豆腐皮和豆乾，加水，小火煮熟即可。此菜味道醇厚，花色又多，一層又一層的特點，可謂是標準的「徽州製造」。據說當年徽州績溪人胡適當北大校長時，用「一品鍋」招待續溪女婿梁實秋，就得到過稱讚，後來他在任駐美大使時也經常以家鄉的「一品鍋」招待外國友人，還曾在「一品鍋」宴請美國恩師杜威，贏得舉座讚譽，成為美談。這是徽菜第三「奇」。

類議論的人和事，您自然會付諸一笑，一百年雲煙過眼，這個調調不猶在耳邊乎！

我因心臟「搭橋」遵醫囑休養，住在鄉下時多，回城始來示，還覆為歡。從我的治病保健來看，手術靠的是西醫，術後調理則以中醫為主。這也體現了您所說的「雙文化」？

如有指示，通過我的電郵信箱……就快得多了。立冬已屆，祈多珍攝！健康長壽是頌。

邵燕祥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五日

【附：關於周有光先生「雙文化」論點的一些說明】

周有光先生是在人類發展的背景下闡述「雙文化」的。公元前一千年之前，地球上已有七個文化搖籃。其中有六個（尼羅河的埃及聖書字文化，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字頭文化，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化，小亞細亞的赫梯文化，阿拉伯半島的米那文化，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化），分布在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以東，它們是西方文化的搖籃群。而黃河流域的中國漢字文化，處在遙遠的東亞，被無法攀越的喜馬拉雅山脈隔開，它是東方的文化搖籃。

到現代，歐亞大陸四個文化區（西歐、西亞、南亞、東亞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。變化最大的是西歐文化，它擴大到美洲，成為「西方文化」。相對於「西方文化」，西亞、南亞和東亞的文化統稱為「東方文化」。「西方文化」傳播到整個世界，區域文化擴大為國際文化。

周有光先生指出，西方文化中一系列方興未艾的發明和創造，改變了人類的生活。西方文化發展成為國際文化的主流，也就是國際文化的現代文化。國際文化是全人類的共同創造、由全人類共同利用，它不是封閉的，而是開放的，任何個人或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，發揮自己的創造才能，從國際文化的客人變為國際文化的主人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，今天的個人和國家已經不自覺地普遍進入了雙文化時代。拿個人的「食衣住行衛教娛」為例。食：中餐和西菜。衣：中服和西裝。住：四合院和公寓樓。行：汽車和

報周有光先生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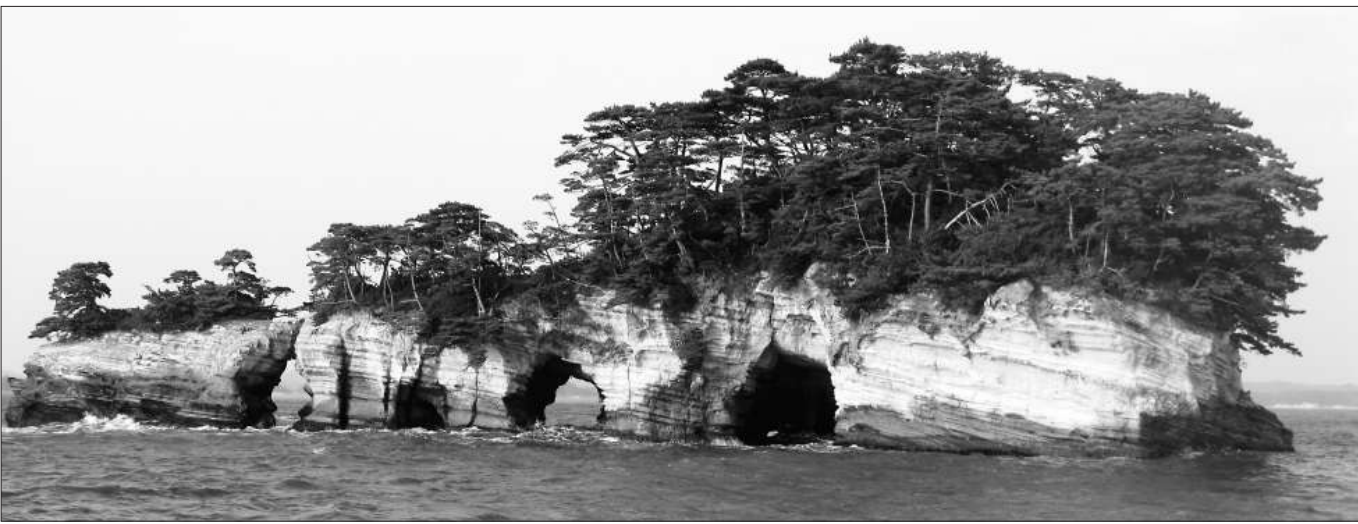
有光先生：您好！

賜件拜讀。學者龐鳴的網文《周有光先生的「雙文化」論》，對您的理念作了簡練的概括。兩年讀過您的《學思集》，乃至有關各篇早在九十年代的《群言》雜誌刊出時，就曾為您的真知灼見折服。

最值得感謝的，是您以平實的言語，講了一個關係人類命運當然也包括中國命運的大問題，深入淺出，舉重若輕。這是從歷史的制高點上，以俯瞰世界的大視野，對東西方文化，對國際現代文化和民族傳統文化關係的「指點」，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套話，也沒有故做艱深，更沒有故作驚人語之，但對於像我這樣的人，是頗有說服力的。

您說，在全球化時代，世界各國都進入國際現代文化和地區傳統文化的「雙文化」時代。您指出，世界各地的傳統文化，相互接觸，相互吸收，其中有普遍價值的部分融入全人類「共創，共有，共享」的國際現代文化；同時，各地傳統文化依舊存在，但是要不斷進行自我完善。我想，那些真心誠意愛護傳統文化，而並非藉口傳統文化鼓吹狹隘民族主義的朋友們，對此也會贊同的。

您又舉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雖然西方學者居多數，但東方學者（華人、日本人、印度人等）也榜上有名為例，說明現代文化是全球化的文化，任何人、任何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，做出創造，共同利用。因此把現代文化說成是西方文化是不正確的，說成是美國文化，更加不正確。您且說，國際現代文化的精髓是科學，既包括自然科學，也包括社會科學；而科學不分民族，不分階級，不分國家和地區。您這話在有的人那裡卻會碰壁：他們繼承四五十年前指自由民主為「資產階級的遮羞布」的論調，說不要把「西方價值觀念」尊為人類普遍價值。您對此或不陌生，您以一百零三歲高齡，親見過清末民初某些大老一邊並不拒絕電燈、汽車等來自「奇技淫巧」的「物質文明」，一邊卻大談「精神文明還是咱們的好」……對於今之發此



很多祖傳做傘的傘匠。

世上最有名的傘，當推英國首相張伯倫的黑傘。雖然英國倫敦以多霧常雨著名，但是，出席國際會議他也傘不離手，實是一絕。如今，黑傘好像變成了英國紳士的一種派頭，又是手杖，又是武器（據說可用來打狗和防備搶劫）。

007的電影裡頭，男人身上的許多飾物：手表，鋼筆，打火機，公文包什麼的——都暗藏玄機，必要時就變成了應急救難的工具或兇器。在傘柄的設計上，據說機關也不少。最美麗的傘，當然是印象派的畫上那些法國淑女們撐的太陽傘，它遮陽的實用性好像變得次要了，反而成了如同搭配女衣服用的裝飾品。

法國散文家蒙田，在文章裡提過意大利的太陽很毒，可是他還是拒絕用傘，理由是：「它帶給我們手臂上的沉重負擔，比對我們頭部的

中國三十年變化令人眩目

夏威



今天中國社會文化的多元化，在三十年前是人們所難以想像的。在大小城市，有經典藝術的殿堂歌劇院、音樂廳，有「新新類」常光顧的迪吧、酒吧，有大大款出的夜總會、歌舞廳，也有低消的電影院、露天舞場，在體育館、港台歌星的傾情演出可以讓上萬歌迷瘋狂。人們穿着打扮的花樣越來越多，年輕人的頭髮五顏六色，但沒人頭頂論足。八十年代初期因喇叭褲、大鬍角引發的社會大討論在如今的年輕人看來實在莫名其妙。

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變化，有勤勤懇懇的上班族，也有養尊處優的留守婦人。兩代人之間的包容性也在擴大。「代溝」不像以前那麼深了，長輩的尊嚴感弱化，開始能夠接受後代平等的觀念。

雖然中國目前的法律還不夠完備，但民衆的法制意識在提高，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。這些年來，家庭內部、親戚之間打官司的多了，原告官的多了，為維護名譽上法庭的多了，要求精神賠償的多了，名譽權、肖像權、教育權、健康權、消費權乃至住宅的採光權、通風權等受侵害也成為人們通過法律「討說法」的理由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國內地的國門剛剛打開，全盤西化、崇洋媚外等思潮泛濫，有人以研究西方哲學為名，而普通百姓則為家中台本產收錄機或十四寸彩色電視沾沾自喜。有海外親戚更有炫耀的資本。但隨着經濟的高速發展，特別九十年代以來，城鄉建設日新月異，國貨全面佔領國內市場，人們的生活水平穩步提高，心態也變得平和和自信了。雖然家當富、肯德基店不上邊兒，但人們顯然是衝着美味和優質服務而來，與崇洋沾不上邊兒。

老一輩人記得，八十年代有不少人熱衷用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。如今，新聞和訊息不斷開放，如果誰還有聽美國之音的愛好簡直可以稱得上珍稀人類了。

今年北京奧運的成功舉行和載人實驗飛船的順利發射，更大大提升了中國人的民族凝聚力、自豪感和自信心，對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。

行走的屋頂

喻麗清



《史密松納博物館月刊》裡，有一篇說到「傘的歷史」的文章。沒有人真正知道傘是誰最早發明的。但是一般推測，最早用傘的人是埃及人和中國人。那時候的傘不為擋雨，而是為了遮陽。並且只有國王或皇帝才用。

那篇文章最使我覺得有趣的是它提到：「中國傳說在公元前一千年木匠魯班的妻子發明了傘，因為她曾誇海口說她能做 Portable roof」（手提式屋頂）。

中國的台灣曾經號稱「製傘王國」，因為台灣傘行銷全世界之故。但是，真正在觀光客們的旅遊手冊上宣稱是「傘的王朝」的卻是意大利的 Gignese——那裡有世上獨一無二的一家專門收集傘的博物館，那裡的居民有